

去年捐献器官超前四年总数

我省年捐献数猛增至113例,但仍是杯水车薪

本报济南1月11日讯(记者 李钢)“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器官捐献数量已经有了大幅增加。”山东省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据介绍,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联合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山东省为第一批试点省份。

试点工作启动四年多来,器官捐献数量大幅增加。截至2014年12月2日,全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2948例,累计捐献器官

7822个。其中,2010年至2013年间共捐献了1448例,而2014年一年的捐献量就超过1500例,器官捐献量已超过往年的总量。山东省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器官捐献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据统计,截至目前,山东省实现器官捐献186例,其中肾脏334个、肝脏138个、心脏1个、眼角膜132只。其中,2014年全年实现捐献113例,单年捐献数量超过2010年至2013年4年捐献总和。

“现在器官捐献的数量确实越来越多,但是和需求相比,还是相差很大。”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及肾移植中心主任门同义表示,在该院登记等待肾源的患者就有300个,其中很多患者在等待中离去。

“相比肾脏,需要肝脏移植的患者往往病情更急,能等待的时间往往更短。”省立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山东省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刘军说,目前的人

体器官捐献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门同义表示,死亡捐献的器官是最优的选择,然而,在捐献器官不足的情况下,不少患者最终只能选择“亲属捐献活体器官”。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可以向亲属捐献活体器官。

专家说法

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器官捐献每一步
都须有第三者监督**



黄洁夫(资料片)

黄洁夫曾任近十二年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在国际医学界被视作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领军人物。2014年3月1日,黄洁夫担任新成立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9个月之后的12月4日,黄洁夫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自愿器官捐献
成移植使用唯一渠道**

2014年的最后一天,知名出版人洪晃公开撰文,就坊间流传的其母亲章含之曾经器官移植是使用死囚聂树斌器官的传闻发声。洪晃写道:“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妈妈换肾所采用的器官与1995年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无关……但是我不能肯定她的肾移植跟王树斌、张树斌或者其他死囚无关。”洪晃并且说,如果我们要谈器官移植,那我们必须谈一下中国刑法下死囚的权利。

就在洪晃发声的第二天,2015年新年伊始,中国大陆将结束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主持这项改革的黄洁夫说,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与同僚十年磨一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为什么2015年取消死囚的捐献呢?因为我们把公民自愿捐献和死囚器官放在一起,那公民的自愿捐献就会大打折扣。”黄洁夫告诉记者,全面取消死囚捐献,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对死囚的尊重,另一方面是对全体公民表示公平。

**器官捐献、分配体系中
理清各方关系最为关键**

记者了解到,中国器官捐献的顶层设计里有五大体系,包括从人体器官的捐献、获取、分配,直到移植后的登记和监管。为了保证公平透明,卫生行政部门、红十字会、社团组织和医院等多方共同参与。黄洁夫认为,在建构器官捐献与分配的庞大复杂体系中,理清各方关系最为关键。

被问到未来我们在管理体系当中,怎样去厘清卫生行政部门、红十字会与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时,黄洁夫说,卫生行政部门,更多的是要发挥社会的力量。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中华医学会社团组织必须在器官移植的服务中间起关键的作用。红十字会应该是充分发挥它第三方的这个社会动员、社会宣传还有人道主义救助,另外,捐献获取这个过程中间要见证,不能全部是医生,必须有第三方。

“获取和分配必须是红十字会和卫计委共同来完成。通过中国医院协会举办的OPO联盟(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来完成这件事情。”黄洁夫说,OPO是器官获取的中间一方,OPO要保证器官的获取过程中是捐献者自己的意愿,保证有他的家人同意,保证这个捐献者是符合中国器官捐献死亡的标准,实际上我们的器官捐献工作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有第三者监督,可以不是一个第三者。

“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可溯源,是阳光的,没有那么利益的。”黄洁夫说。

据凤凰卫视

延伸调查

“听到救护车声,就觉得是不是肾源送来了”

不少患者只能在等待中离开人世

“等待的滋味儿太难受了,别人是没办法体会的。能等来还好,要是最后都没等来,那就……”说到这里,赵青哽住了,好一阵没再开口。不少和赵青一样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在网上组建了QQ群和贴吧互相取暖。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李钢

一场病花百万 拖穷了一个家

47岁的赵青来自泰安,身患尿毒症四年。虽然现在每周透析三次,肌酐指数还是超过正常水平近10倍,正在等待肾脏移植。“已经在千佛山医院住了好几个月,这两年一多半的时间都是住在医院里。前两天听说医院来了两个肾,都给别人了。”

12年前,赵青感觉没干多少活却总是疲惫不堪,走路像踩在棉花上。到医院一查,尿蛋白增高,属于肾病综合征,慢慢地,赵青生活的主旋律就变成了治病。更让人绝望的是,四年前,肾病转化成了尿毒症,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四处求医看病,承担着巨额医疗费,最后还是不得不走上透析的路,这几乎是所有严重肾病患者的共同经历,“儿子小时候一直挺好。”母亲李云霞说,孩子9岁时,尿尿总说疼,医生检查后说,孩子膀胱输尿管逆流、左肾萎缩、右肾积水,挺严重的病。

“带着儿子去北京做了好几次手术,平常也要不断地治。”李云霞说。10年的求医路花尽了家里的积蓄,儿子韩亮也长成了大小伙子。更不幸的是,孩子的父亲在九年前的一次意外中去世,这九年间,李云霞和她的大女儿一起赚钱,为韩亮治病。

赵青奔波的医院更多,除了泰安当地的医院,还有济南、北京、南京……“为了挂上号,常常凌晨4点就要到医院排队,一直到7点多医院才开始分诊发号,有时一天下来都看不上医生了,连带检查拿药什么的去一趟就得五六天时间。”一个月一次,赵青三年下来去了南京30多趟,依然没看到好转的希望。“有些专家,光挂号就要三四百块钱,是我这个病硬生生把家里给拖穷了啊。”一提到钱,赵青就有些自责,“这些年下来,光治病就花了一百多万。”



1月7日,儿子看到为自己捐肾的母亲李云霞痛哭不已。 本报记者 李钢 摄

等不到肾源,母亲毅然决定为儿捐肾

“再不做肾移植,孩子就命没了。”2014年春天,医生告诉李云霞。

从开始透析时,他们就在医院登记了等待肾源,到现在两年半了,仍未等到。“之前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给孩子捐肾。”李云霞说,“我捐了肾,劳动能力受影响,儿子谁来照顾?谁来养活?”

6成以上移植的肾是母亲捐献

“在我们这里登记等肾源的有300多个患者。”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及肾移植中心主任门同义说,其中很多是等了多年,亲属配型也没有成功的。有些患者只能在等待中离开。在省城具有移植资质的医院,都有很多登记在册的等待移植的患者。

门同义介绍,该中心在2014年完成了100多例的肾移植手术,其中超过70%的肾源来自“亲属活体器官”,“而在这些亲属活

眼看儿子的病越来越重,2014年10月,李云霞瞒着儿子偷偷去做配型,等结果的一个多月是李云霞最难熬的日子。“很幸运,配型成功了。”李云霞说,当她告诉儿子时,儿子痛苦不已,“劝了好多天,儿子的心才慢慢软了下来。”随后,李云霞带着儿子住进了省千佛山医院。

体器官中,又有超过70%的是父母捐献给子女。”

“尤其是母亲捐献的更多,能占到六成以上。”门同义介绍,仅2014年就有30多位母亲在该院为自己的子女捐献肾脏。

“母亲给子女捐献的确实要多一些。”省立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山东省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刘军也表示,在肝脏移植中,母亲捐献同样占60%左右。“这一是说明母爱的伟大,再就是其中也可能有些现实原

2014年最后几天,就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李云霞和儿子韩亮完成了肾脏移植手术。“配型成功,我们很幸运,但是孩子移植完了仍然需要一直花钱,一直吃抗排异的药物,要定期复查。”李云霞说,之前十年求医路不仅花光了积蓄,更是负债累累。一想到未来,李云霞只能默默流泪。

“专家分析说,很多肾移植患者来自农村家庭或者经济状况比较差,‘男人是主要劳动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捐的更多。”

在茫然等待肾源的日子,赵青甚至会有些幻觉,每次听到救护车鸣啦鸣啦的声音,就觉得是不是有肾源送过来了?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大的失望甚至绝望。“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等来,也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我就等不来了。”赵青沉默了。